

林徽因文存

散文 书信 评论 翻译

陈学勇 编



四川出版集团·四川文艺出版社

林徽因文存

散文 书信 评论 翻译

陈学勇 编



四川出版集团·四川文艺出版社



林徽因在家中

林徽因一九三二年春致胡适

[illegible]



林
徽
因



一九二四年四五月间林徽因(右二)在北京与徐志摩(右一)、梁思成(左一)、陈岱孙(左二)、林长民(左三)、恩厚之(左四)、泰戈尔(右三)在一起



一九四七年三月由上海“晨光出版公司”初版印行的《志摩日记》和二〇〇三年一月由“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初版印行的《徐志摩未刊日记》都没有编入林徽因致胡适信内反复念及的徐志摩《康桥日记》。林徽因一九三二年一月一日晚上致胡适的信中谈到徐志摩《康桥日记》时认为“不会以被人恋爱为辱”，并说：“我只是要读读那日记，给我是种满足，好奇心满足，回味这古怪的世事，纪念老朋友而已。”

我真不知道我要说的是什麼話，我已写好
 几次提起这件事来想写，但是每次总是写
 不成篇。这两天我的头脑甚是昏沉，因而看
 那团书报都只见大前晚模糊的凄清的月色，
 照著我们不寂寞的车厢，远远的向荒野里退去，
 醉卧！怎处的能叫人相信？我想若了就要夜
 了！这夜了月二，谁敢割口断？我的眼前又

恩厚之保存下来的徐志摩一九二四年五月二十日写于车上来不及交给林徽因的书信手迹

林徽因《纪念志摩去世四周年》初刊于《大公报》“文艺”副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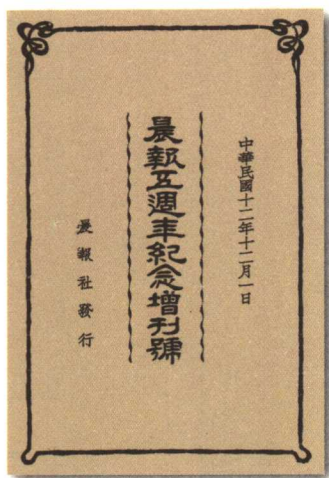




林徽因一九三六年夏在家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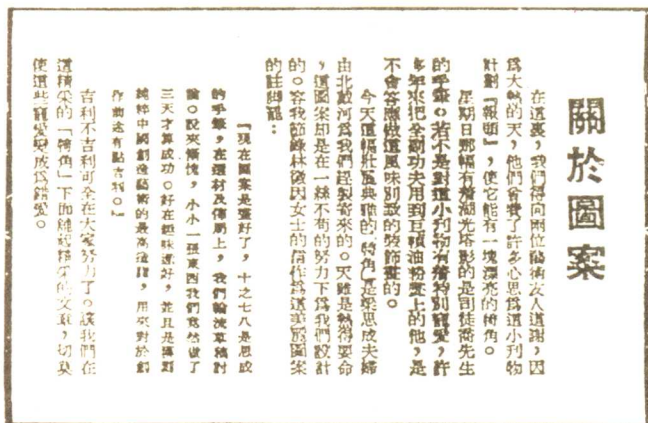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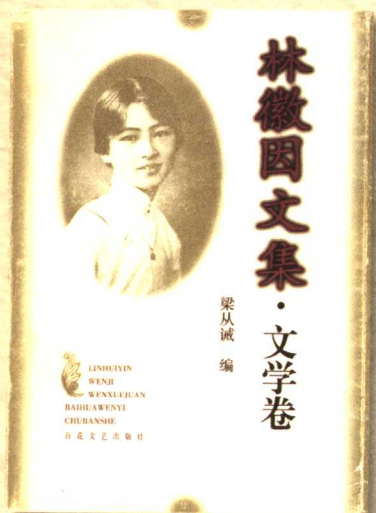
由林徽因指导常沙娜、钱美华和孙君莲设计的敦煌图案丝质彩印头巾，参见本书《和平礼物》



林徽因不仅为《晨报五周年纪念增刊号》提供译作《夜莺与玫瑰——奥司克魏尔德神话》，还为此“增刊号”设计了封面图案

含有林徽因书信片断的《关于图案》和林徽因、梁思成设计的“报头”图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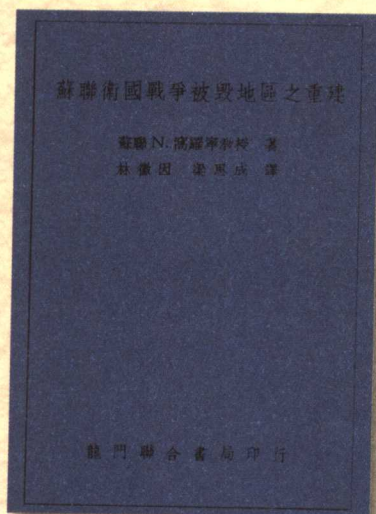




梁从诫编《林徽因文集》一九九九年四月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初版，两月后再版



林徽因《我们的首都》连载于《新观察》



林徽因、梁思成译《苏联卫国战争被毁地区之重建》一九五二年五月由「龙门联合书局」初版印行

《林徽因文存》前言

陈学勇

林徽因(一九〇四~一九五五),这位近百年来曾数度灿烂的建筑学家、文学家,直到她身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才印出她的第一本文学作品《林徽因诗集》,其时知道她名字的读者仍寥寥无几,即使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与教学的专业人员对她往往也所知甚少,尚未纳入文学史家的视野。不久因“徐志摩热”的缘故,林徽因的名字频频出现于媒体。电视剧《人间四月天》播出,林徽因差不多已是家喻户晓的佳丽了。然而,历史人物林徽因与现今媒体宣传的那个沉湎情爱的闺秀相去实在太远!林徽因生前很不喜欢人称梁太太,如今她却凭借另外一个并非丈夫的男性为后世所熟知,九泉之下该是如何的无奈。

已经举行了林徽因百年诞辰纪念会,作为后学,编一部力求囊括她全部著作及片断文字的《林徽因文存》,既意在纪念先贤,亦是为正误纠谬,让世人从《林徽因文存》里认识一个极富人格魅力和文学才华的杰出女性。

当人们称誉林徽因建筑业绩(她的本职是古代建筑研究)时,很少有人了解,作为女性,又可能被人想象成娇弱的太太,她为此付出过怎样的辛劳(这辛劳正是她当年留学不得入读建筑系的原因,那时美国大学顾虑到建筑学需野外作业而拒收女生)。她寻找考察遗存的古代建筑,无数回奔波于穷乡僻壤,或黄沙扑面、或跋涉泥浆,还难免住鸡毛小店惹一身跳蚤;她测量古塔,攀登数十米高的塔顶,踩着风雨剥蚀的残砖朽木,随时有坠落危险,有时站在了死亡的门槛上;考察回来又抱重病之躯不分昼夜地描图、撰稿,著述连连。她完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设计竟是医生宣告她不久于人世的日子;病逝的前几日,她还念念不忘叮嘱学生:“景泰蓝是国宝,不要在新中国失传。”林徽因于事业的勤奋执著,当得起一句古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在经济萧条、科学落后的旧中国,在远不算漫长的人生历程里,她得以取得建筑设计和研究的光辉成就,非怀有崇高的敬业献身精神不能为之。这精神,不仅表现在艰辛劳苦,而且也冒过恼人而可畏的精神压力并政治风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苏联“老大哥”的影响渗透到中国各个方面,一切唯“老大哥”为是。受此影

响，主持中南海建筑修缮设计的工程设计者曾与担任顾问的梁思成意见相左，这位工程师写了《民族形式和“国粹”》等一组文章，不点名地批评梁思成“想尽方法把中国的旧形式揉到现在的新作品里”。他主张远离民族传统的创新，其实是“苏化”。林徽因在他的文章上批道：“假使许多中国建筑师都只是从西洋建筑系统（笔者按：苏俄建筑实西洋建筑一部分）的教育里培养出来的，而且在鄙视中国文化的时代中成长，他一定反映西洋建筑的性格基础。而缺乏中国文化的培养，他的创造太可能是半殖民地式的第二代，西洋杂志里现代建筑外表的摹仿者而不自觉。”这里不能把林徽因、梁思成和这位作者的分歧看作纯粹个人之间的学术争辩，显然它关系到背后敏感的对“老大哥”的态度问题。同样，不久发生了保护故都古建筑争论。但历史证明：林徽因的建筑贡献，不仅在于成功的业绩，还包含着失败的努力。

林徽因所以经受住物质和精神双重磨炼，完全出于忠诚祖国的赤子之心。她受过正宗的欧美教育，说流利英语、写漂亮英文、按英国人习惯喝下午茶，似乎十分地洋气，但相知者说她“从不崇洋，更不媚外”（卞之琳语）。她自己早就宣称“洋鬼子们的浅薄千万学不得”（《窗子以外》），发扬祖国建筑传统乃是她毕生追求。这赤诚在外敌入侵之际表现得尤为感人。“七七”之前她警觉到日寇的亡我之心，责备有的亲友民族意识淡薄。卢沟桥炮响，她立即写信勉励才七八岁的避暑在外的女儿：“如果日本人要来占北平，我们都愿意打仗，那时候你就跟着大姑姑那边，我们就守着北平，等到打胜了仗再说。我觉得现在我们做中国人应该要顶勇敢，什么都不怕，什么都顶有决心才好。”北平陷落后，当梁思成一接到日寇“亲善”请帖，林徽因就和丈夫扔下家产，连夜扶老携幼，躲过封锁，匆匆离开了故都。——这是将面临物质生活巨大落差而毫不犹豫的抉择。以后她在昆明街头提着瓶子打油买醋，李健吾先生十分感叹：“她是林长民的女公子、梁启超的儿媳！”李健吾不知，以后林徽因还要穷到买不起鞋的地步，儿子只得赤脚穿草鞋上学，而且是最便宜的草鞋。颠沛流离的长长岁月里，一些知识分子经不住苦难煎熬，渐渐变得平庸、颓唐，林徽因则要么哀怨自己病弱成抗战累赘，要么亢奋、昂扬，和儿女一起高唱《义勇军进行曲》，教他们朗读《唐雎不辱使命》、背诵“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她曾和儿子有过一次动人的对话。儿子问：如果日军打进四川怎么办？她答：中国念书人总有一条后路嘛，门口不就是扬子江吗？儿子急了，又问：我在重庆上学，你们不管我啦？她不无歉疚地轻声回答儿子，又仿佛自语：真要到了那一步，恐怕就顾不上你了！所

幸局势没有危急到那种地步，然而长期极度贫困的物质生活正暗中销蚀她美丽的生命，未满四十的林徽因正值盛年，形貌却憔悴苍老，疾病又使她如风中残烛。为挽救这一美丽生命，外国友人安排好她出国疗养，她再一次作出了坚毅的抉择——决不做“白俄”，坚持留在祖国与同胞患难与共！

如果说，林徽因于事业于祖国，表现了非凡的丈夫气概，令人敬佩的话，那么，在个人情感天地里，她的重情、爱美，使她格外地显示出魅力。读者认识林徽因，不能止于她的美丽容貌，还应深入到她爱美、懂美的个性和修养。她对任何美的景、美的人、美的事都会兴奋，哪怕是身处困境或健康极坏的时候。战乱中的昆明，在病入膏肓的林徽因眼里，仍看出“昆明永远那样美，不论是晴天还是下雨。我窗外的景色在雷雨前后显得特别动人”。她情感丰富、细腻，讲究感情生活，曾经说：“凡是在横溢奔放的情感中时，我便觉到抓住一种生活的意义，即使这横溢奔放的情感所发生的行为上纠纷，是快乐与苦辣对掺的性质，我也不难过不在乎。”甚至说：“没有情感的生活简直是死！”（致沈从文信）我说她的情感生活，决非指被虚构并渲染得如琼瑶小说似的徐、林之“恋”。这一场单恋，在徐志摩确实落花缤纷、爱意无限，但林徽因未必也有此意。徐志摩留学剑桥时不过一个乡下富商子弟，尚未脱尽商贾人家的俗气（他至死都不能说已一尘不染）；林徽因自己又不过是才出国门且未成年的千金，也不能说她脱尽闺秀的传统意识。何况两人还隔着七八岁年龄差距。再加徐志摩的妻室之累，这些障碍都是林徽因很难逾越的，不可想象她如电视剧里那样回应徐的感情。对此她致胡适、沈从文等人的信函中有过明确表白。今人不应以他们日后身份（一个著名诗人、一个洋派留学生），想当然地往回推想当初情景，以为必有浪漫故事。真正令林徽因萌生过爱意的人是哲学家金岳霖，可是林徽因把通常的“三角”关系处理得非同寻常。她如实告诉梁思成，自己与金岳霖彼此生了爱意，又仍爱着梁思成，正不知所从。她如此坦荡，令许多女子包括不少著名女性作家们汗颜。梁思成尊重林徽因的选择，尽管他为可能失去爱妻极为痛苦。金岳霖得知梁思成的痛苦心情和诚挚表态，毅然放弃追求，甘愿以恋情之外的方式爱护林徽因，并终身不娶。萧乾赞叹道：“这三位都是了不起的人，有才能，有学问，品格高尚。他们之间是人与人关系臻于最美最崇高的境界。”（致笔者信，未刊）林徽因与金岳霖的短暂爱恋、长久情谊，远比有人津津乐道的徐、林之“恋”值得大书特书！若要写徐、林交往，与其捕风捉影编织莫须有的故事，不如张扬他俩后来相处过程中所表现的纯真、坦荡，哪怕流言

四起,林徽因始终心态正常,泰然自若,同样不失为萧乾称颂的“崇高至美的境界”。

人无完人,林徽因亦非完人,自有她的短处,有的缺点尚显而易见。不必讳言林徽因有其性格弱点,但正视她弱点的同时,还必须透视其弱点包含的可贵因素。换个说法,某些弱点可能属于她可贵品格的另一种表现。譬如她的急躁和好胜,这很犯我国传统道德的训诫,到了女性身上尤其遭致非议。可是急躁和好胜恰是林徽因事业得以辉煌的不可或缺的性格因素。朋友说“梁、林不是打发日子,日子不够用”,学生说她是“有十分力气而更使出十三分来的人”。她自己的箴言是“少一事不如多一事”。不妨设想,林徽因若不是那般好胜,她的成就难保不打些许折扣。再如传闻她与女人们不太合群,李健吾夸张为“几乎妇女全把她当做仇敌”。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她的直爽性格。中国的婆媳几乎是天敌,梁思成后母却评价林徽因属“刀子嘴豆腐心”。客观看来,聪明绝顶的林徽因,交往多属各界顶级精英,女性中鲜有此辈。她们既不能和林徽因于同一层面对话交流,林徽因更不会世故地作谦虚状与之敷衍、周旋,那么她遭到误解、生分以致嫉妒、怨愤怕是难免的了。林徽因不太合群的表象正内含脱俗的率真性情。再试想,林徽因若耗费精力作并无意义的虚与委蛇,她的事业成就又将打多少折扣。

如此不惮絮叨地介绍作家、建筑学家之外的林徽因,一则考虑到媒体上林徽因走得几乎面目全非,再则遵从我国知人论世批评传统。多方面了解林徽因人品性格,有助理解她的文学创作,自然也更真实地贴近了这位历史人物。

林徽因的人格魅力与她的过人才华,缺一不可,合铸了这位富于个性的现代女性。近来人们喜欢称她“第一才女”,虽这样表达未必科学,然足以见出推崇之心。

林徽因于建筑领域的才华一般读者知之甚少。我于建筑完全外行,无力阐述林徽因这方面的突出成就和历史地位。但就我所知,奠定梁思成业绩地位的重大古建发现、重要建筑著述,无不有林徽因参与其间,即使仅以梁思成单独署名的著作,梁思成必不忘说明其中林徽因的劳动和奉献。林徽因、梁思成夫妇的子女和林、梁的同事,都表示过一致看法:梁思成的卓越成就,没有林徽因的比肩奋斗则难以想象。国宝梁思成的辉煌无疑是他们夫妇珠联璧合的共同结晶,建筑学界历来是梁、林并称。这里不必说林徽因另有她独自的建树了,如对民居研究超前的关注、对以景泰蓝为代

表的旧工艺的继承改造,以及国徽设计中她的突出作用。林徽因把似乎冰冷的建筑科学,注入诗人式的热情,使它兼有了艺术光彩。她说:“这些美的存在,在建筑审美者的眼里,都能引起特异的感觉,在‘诗意’和‘画意’之外,还使他感到一种‘建筑意’的愉快。”(《平郊建筑杂录》)据建筑专家谈论,林徽因提出“建筑意”概念,是她对建筑学一个富于创造性的贡献。她的同行还觉得,林徽因在研究工作中迸发的才情胜过了梁思成,以至这么说,自林徽因去世,梁思成的文章明显地逊色。所以吴良镛院士缅怀林徽因时问道:“在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的门厅里,要不要在梁先生塑像旁补上林徽因先生的像?”(《林徽因的最后十年追忆》)在清华大学林徽因百年诞辰纪念会上,吴院士重提此事,又补充说:塑像必须精美,要见其精神,不然宁可阙如。院士的崇敬之情溢于言表。与会的众多当今建筑学界权威交口称誉,正是林徽因享誉中国建筑学史的一次公证。

更为读者熟知的林徽因当然是位作家。林徽因的创作,恰如她赤诚于祖国,坦诚于丈夫,热诚于友人、同事、学生的为人,她的为文态度可归结为真诚,这在她为数极少的文学评论里却有充分的阐发。她给《大公报文艺丛刊小说选》撰写的“题记”一语中的:“作品最主要处是诚实”,“即是作品需诚实于作者客观所明了,主观所体验的生活”。她反对作家“敲诈自己有限的幻想力去铺张出自己所没有的情感,来骗取读者的同情”。作品恪守情感诚实,乃贯穿林徽因一生创作,差不多是读者进入她文学客厅的一把钥匙。竟然有传记评论林徽因前期诗歌“有些‘为赋新诗’(笔者按:当为词)强说愁”(百花文艺出版社版《林徽因》),这是否有点亵渎了女诗人。

林徽因文学创作起步于诗,在读者中也以诗最具影响。那些抒发个人情感的诗篇,以其真挚、优美赢得一批“林迷”。在学术界,林徽因诗歌研究似过多地强调徐志摩对她产生过的影响,因此阐述林诗内涵的丰富、深刻便受到局限。其实林诗多数篇章与徐志摩洒脱灵动、艳丽悱恻的诗风是有别的,《时间》、《前后》、《风筝》无不于轻柔外表里寄寓凝重隽永的沉思。由于疾病缠身,林徽因的诗篇有时不免情绪低沉,但不宜就此夸大,它们并不像常被引用的她那句诗“信仰只一炷细香”,被人说成经不住西风沙沙地吹。要知道在引的这一句所在的全篇里,诗人接着又吟咏了“秋天的骄傲是果实,/不是萌芽,——生命不容你/不献出你积累的馨芳”。热爱生活、乐于奉献才是林徽因个性的基调,不妨读一读《雨后天》、《莲灯》、《激昂》、《红叶里的信念》。即使病痛折磨得她难以忍受,医生断定她来日无多时,纵然写出略显感伤的《病中杂

诗》，同时却还写了毫不伤感的《死是安慰》，决没有徐志摩某些诗作流露的颓废气息。林徽因另有不少落笔“窗子”以外的诗作，如《微光》、《年关》，反映诗人关注下层人民的真挚情感，至今读者和学者都未能予以应有的关注。当同时期不少诗人，或为民呐喊但流于粗制滥造、或精雕细镂而忘却民生疾苦，鲜有林徽因这类以优美形式表现“窗外”内容的精品。林徽因创作缘起确与徐志摩有过一点关系，她曾以《新月》为创作园地（事实上发表于《新月》的诗作数量很是有限），以及曾与徐志摩有过交流切磋，作品入选进《新月诗选》。凭这些事实归她为“新月诗人”似乎不无依据。可是林徽因“从不认为自己就是‘新月派’，也不喜欢人家称她为‘新月派诗人’”（梁从诫《倏忽人间四月天》），她不是没有理由。虽为女性的林徽因，和新月一些男诗人们相比，她的诗歌反而能多一点思想分量、多一点表现力度。她在技巧方面化用小说里白描手法入诗，素描人物或场景，以生活画面支持浓郁诗情，这记叙成分委实为“新月诗人”笔下所不多见。一定要说林徽因属于新月派，至多限于她短暂的初期作品吧。

林徽因小说较之她“言志”的诗歌来说，明显偏于“载道”，她仅有六个短篇小说，大多充溢着社会关怀，更为展露她的阔大胸襟。《九十九度中》显示都市众生相，关注纷扰的种种矛盾；《吉公》反思人物命运，折射一段时代陈迹；《文珍》颂扬底层人物，从沉闷现实里发掘社会生机。三篇小说各从一个侧面反映作者关注“窗”外的写实倾向。其中婢女文珍是个光彩夺目的艺术形象，她善良、温柔，而又刚毅、干练，既善且能，不甘心任由主家摆布，终于出走，奔向广阔天地去争取美好人生。文珍可跻身中国现代小说史上最美的女性形象行列。《窘》是林徽因的小说处女作，描写主人公难以言传的情爱心态，以透辟淋漓的心理剖示赢得称道。最具盛名的《九十九度中》，进而运用意识流手法，借以跳跃结构，篇幅不过万余字，竟鸟瞰了整个都市，弥漫着浓浓的旧都氛围，氛围里种种人物，个个鲜明。作品虽洋犹土，熔中西技法于一炉。联系到此时南方一批作家尝试西方手法显得的生涩，林徽因的娴熟程度就叫人非常钦佩。难怪有大学教材误把林徽因纳入“新感觉派”一节（朱栋霖等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一九九九年年初版本，再版已改正）。林徽因小说风格的理性、大气，到语言的简洁、纯正，颇具张力，这固然为同辈许多女性作家所不及，哪怕置于一些男性文豪中亦不至如何逊色。京派小说家萧乾称誉林徽因是“京派的灵魂”，怕不只是因为她编选过一本产生相当影响的《大公报》“一九三五年度小说选”，当然还在于她的作品代表着京派小说的若干重要特征。

大约还没有人称林徽因为散文家,如不就篇数论,她狭义的美文比小说更少。可又不断有人说,林徽因诗歌“不如她的散文好”(卞之琳语,见李辉著《听“苦吟诗人”聊天》),她的散文应在“五四以来优秀篇目之列”(姜德明《余时书话》),“将这些散文放在散文大家的作品一起也是毫不逊色的”(应国靖《文坛边缘》),由朱自清选入《西南联大语体文示范》的《窗子以外》更是有口皆碑的名篇。此外那些致友人的书信,可谓比散文更其散文。即使她的建筑专业文章,亦有情有致,文采斐然。若干章节、片段,无异于游记或抒情小品。朋友们无不钦佩林徽因健谈、雄辩、睿智、口若悬河、妙语连珠。斯人已逝,幸好留下这些散文,后世读者才得追慕她生前风采。随便翻开她哪一篇散文,譬如写在抗战时期的《彼此》,俨然坐进“太太的客厅”,亲聆她侃侃而谈。

林徽因的四幕剧本《梅真同他们》只完成三幕。这个残篇已足以表明,她写剧的才能不在写小说、诗歌、散文之下。鉴赏品味很高的朱光潜刚读到第一幕便禁不住赞叹:“现在话剧中仍留有不少的‘文明戏’的恶趣,一般人往往认不清Dramatic与Theatrical的分别,只求看一个‘闹台戏’,林徽因女士的轻描淡写是闷热天气中的一剂清凉散。”(《文学杂志》编辑后记)戏里主角梅真也是婢女,可看作她小说人物文珍的“姐妹”,是闯入大都市与上层社会联系愈加密切的“文珍”,梅真较敢于自主的文珍又添了一份浪漫情怀。现代话剧作品里如梅真此类形象相当罕见,她又是林徽因于现代话剧一个不乏特色的奉献。

林徽因在文学与科学两个领域里都能青史留名。中国现代文学史没有第二个这样的女作家,中国现代建筑学史也没有第二个这样的女建筑学家,大概整个中国现代史都难再寻觅到。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巨人,他们为多种学科作出杰出贡献,林徽因多少存留这个时期巨人的遗风,正如与她相知的美国友人费慰梅(Wilma Fairbank)所言,她“是当时你所遇到的人中能够向任何方向发展的一个艺术家”(《梁思成与林徽因》)。这既使林徽因的建筑研究充满人文色彩,又使她的文学创作闪烁理性光彩。民国时期女作家创作,有细腻却失之柔媚者、有豪放而流于粗糙者,林徽因则既充溢灵秀又饱含风骨。再放大了说,五四以后,时代造就了一大批现代知识女性,她们身处社会危难之际,以献身祖国为己任,英姿勃发,才华逼人,不论成功与否,包括进入新中国的岁月,她们始而如逢甘霖,继而受挫迷惘,都无愧为英雄!林徽因和她们的人生历程大同小异,因此以林徽因作个案深入研究,定有其普遍意义。这些年来,对这么一位非凡女性,多的是传播她爱情逸事,缺的是切实探讨,作出恰